

合作才是人间正道

——写在尼克松访华50周年之际

□ 徐 步

1972年2月21日至28日，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成功访华，中美两国签署《上海公报》。《上海公报》的核心是相互尊重，关键是承认彼此不同的社会制度，目的是谋求实现互利合作，致力于世界和亚太地区的和平。

尼克松访华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两国领导人“跨越太平洋的握手”，以及经过艰苦谈判达成的《上海公报》，促成了中美关系“破冰”，为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奠定基础。“尼克松访华旋风”掀起了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热潮。1972年，中国同18个国家建交或提升外交关系级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同外国建交最多的一年。可以说，中美关系“破冰”和迈向正常化，带动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推动国际紧张局势极大缓和。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坚定维护世界和亚太地区和平，赢得了尊重，赢得了朋友，赢得了战略上的主动。

尼克松从一个反共斗士转变为中美友好交往的开拓者，显示了他个人作为政治家的魄力，其改变对中国的观念，也是时代的产物。中美关系在上世纪70年代初发生根本性变化，是世界形势发展和国际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的结果。1972年2月28日，针对尼克松在结束中国之行时说“这是改变世界的一周”，毛主席对周总理笑言：“我看还是世界改变了他们！”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到处伸手，四处扩张，结果深陷困境，独霸世界的梦想变得支离破碎。这促使尼克松转向中国，谋求借重中国的力量实现全球战略平衡。中美这两个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发展阶段不同的国家，搁置双边分歧，实现和解合作，为缓和冷战紧张气氛和维护世界和平发展注入了极大的积极因素。

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美国臆测中国对其世界霸权地位构成日益严峻的挑战，对中国崛起的担忧像沉重的阴霾笼罩在华盛顿上空。拜登政府上台后，对中国推行所谓“对抗、竞争、合作”三位一体政策，虽表示不打“新冷战”，要确保竞争“不会演变成冲突”，要为中美关系设立“护栏”，但又因袭特朗普时期的对华政策，渲染“中国威胁”，声称中美“接触时代”结束，全力聚焦对华战略竞争。其实质是企图按照美国自身利益设定“游戏规则”，阻遏中国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

中国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在中方的大力推动下，《上海公报》包含了中美共同反对“霸权”的内容，声明“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一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当下的美国无视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发生巨大变化，竭力推行强权政治，谋求维持霸权地位。拜登政府调动传统同盟体系，构建“民主科技联盟”，出台“印太战略”，创设新的地缘政治小团伙——例如，美日澳印“四边安全对话机制”，美英澳“三方安全伙伴关系”等等，企图统筹美及盟友在军事、经济、科技、情报等领域的资源和力量，维护其在世界及亚太地区的霸权地位。美国把中国作为其称霸战略的“眼中钉”，显然是找错了对象，打错了算盘。

在台湾问题上，美方在《上海公报》中作

出了对“一个中国”原则不持异议以及美国最终撤出全部在台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承诺。此前，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期间，在台湾地位和撤军问题上的表态也表明美国基本上接受中方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美方在台湾问题上的表态和立场，是中美双方化解分歧、建立外交关系的重要基础。然而，美方40多年来在台湾问题上的表述与立场已经走样、变味、倒退，背离了中美建交时美方与中方达成的共识。出于对华遏制需要，拜登政府打“台湾牌”的动作有增无减。法理上，美抬高《与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的地位，将它们与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并列。政策上，不断推出涉台法案，发布美与台湾交往“新准则”，鼓励美台接触，提升美台关系。行动中，增加台湾国际曝光度，推动支持台恢复世卫组织观察员资格，邀请台参加所谓“民主峰会”，煽动和支持台在立陶宛开设“台湾代表处”，并鼓动欧洲盟友支持立陶宛。这些举动助长了“台独”分裂势力的气焰，触碰了“一个中国”原则的红线，严重破坏了中美关系。

尼克松访华以及中美发表《上海公报》，说明中美两个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发展阶段不同的国家，可以把双边的政治分歧搁置在一边，能够基于共同利益进行战略合作。美方在公报中声明，“美国相信，改善具有不同意识形态的国与国之间的联系，以便减少由于事故、错误估计或误会而引起的对峙的危险，有助于缓和紧张局势的努力”。但如今，美国仍有不少政治人物抱守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拜登政府把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作为服务自身利益和对华进行遏压的工具，企图以价值观为黏合剂，整合盟友力量；以价值观为催化剂，重拾西方内部自信。美反华势力大肆污蔑、抹黑中国政治体制，捏造、炒作所谓涉华“人权”议题，竭力妖魔化中国形象。

50年前尼克松访华，中美开启交往大门，展示了那一代政治家对历史趋势的深刻洞见和准确把握。中美实现关系破冰，是中美双方基于国际形势变化作出的重大战略判断，是中美双方顺应时代潮流作出的重大战略选择。这种判断和选择既是对各自国家利益需要的谋划，也是对实现世界和平的追求。回望过去50年，世界得以保持总体和平，特别是东亚地区能够长期保持稳定并蓬勃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美关系改善和地区形势缓和。50年后的今天，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演变的背景下，我们更需要深刻理解尼克松访华的历史意义，更需把中美关系最初谋得转圜的那段经历作为两国共同的财富继承下来，从中汲取超越分歧、寻找共同利益的智慧与勇气。“脱钩”是开历史倒车，合作才是走人间正道。

华盛顿的政治精英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美国面临的真正挑战根本不是中国造成的，因而“甩锅”中国也注定无济于事。从黑人弗洛伊德发出“我不能呼吸”的呐喊，到去年1月6日冲击国会的暴力事件，再到新冠肺炎疫情死亡人数居世界第一，美国最突出的问题是社会不公、政治极化和治理无能。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者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称，对于美国许多政治领导人而言，“执

政已经成为了体育竞技、娱乐或者仅仅是无脑的部落战争”。美国前资深外交官、前助理国防部长傅立民（Chas W Freeman Jr）在“东亚论坛（EASTASIAFORUM）”撰文指出，对中国发起“贸易战”受害的是美国农民、美国公司和美国消费者，“美国家庭平均每年要多花1277美元购买消费品”。傅立民曾作为尼克松的首席中文翻译陪同访华，见证了中美关系破冰、改善和发展的过程。他批评炒作所谓“中国军事威胁”，指出中国周围到处是美军基地，而美国附近却没有中国的基地。

习近平主席在同拜登总统通电话及视频会晤时指出，中美关系不是一道是否搞好的选择题，而是一道如何搞好的必答题。中美分别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能否处理好彼此关系，攸关世界前途命运，是两国必须回答好的世纪之问。以史为鉴，中美关系要实现长期稳定发展，有几点启示。一是必须坚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二是必须抵制脱钩，超越分歧；消除隔阂，累积互信；排除干扰，聚焦合作。三是必须摒弃冷战思维，摆脱意识形态纷争，致力于文明交流和互学互鉴。四是必须加强人员往来，增进相互了解，践行求同存异，筑牢民意基础。五是必须牢记中美两国作为世界大国，对世界和平、稳定、发展负有特殊责任。

我们应当坚持与时俱进，在重申、延续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共识的基础上，加强与美方的对话沟通。厘清分歧，寻找和培育新的利益共同点，挖掘两国关系发展的新动力。我们应当排除干扰，持之以恒推动务实接触与合作。尽管美国政府要人力图限制中美经贸往来，但去年中国对美贸易额仍创历史新高，表明中美经贸合作符合两国现实需求，符合双方人民切身利益。中美两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抗疫合作、地方交流等领域仍有很大行动空间。我们应当久久为功，厚植中美友好的民意基础。我们要讲好中国和平发展的故事，讲好中美友好交往的故事，讲好中美互利合作给双方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好处的故事。

对世界来说，今天的中美关系比尼克松访华时更为重要。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的不稳定时期，突出特点是美国自身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单边主义及反全球化思潮严重上升，成为国际形势变化的最大不稳定因素，致使世界各种传统和非传统安全挑战更加严峻。当前，中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对国际事务的影响突出上升。如果说中美关系在50年前是影响国际形势走向的变量之一，如今正成为关键性因素。美国应当适应世界的新变化，摒弃强权政治，丢掉冷战思维，学会同中国及其他新兴大国相互尊重，致力于和平相处，努力实现合作共赢。

（作者系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秘书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



我们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据估计，截至2021年底，因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将新增1.5亿极端贫困人口。由于气候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据有关预测，到2050年，冰川融化和海平面上升，可能让多达10亿人口流离失所、数百个城市被淹没。

联合国项目事务署和牛津大学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基础设施状况影响了92%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该研究呼吁转变基础设施规划的模式，即，我们不应该将基础设施看作是一个个建筑物或建筑群，而应视其为一个体系的组成部分整合起来，该体系具备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巨大潜力。基础设施不仅仅是建筑，它是人类的庇护所，能连接社区、消除障碍，让儿童获得教育机会、保障家庭生计、促使人们采取健康的生活方式，能减少不平等现象、解决流离失所背后的原因，能创造归属感、维护世界和平。根本上说，全世界的基础设施还不具备应对全球危机的能力。我们需要有更韧性的基础设施，能够适应和承受不断变化的环境，不管是大流行病还是气候变化的影响。我们需要大规模地投资建设可持续的基础设施，在2030年前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因此，“一带一路”倡议聚焦基础设施，为支持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了重要机会。

目前发展中国家的财政资源远远不能满足需求。据估计，即使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前，到2030年全球基础设施投资需要超过90万亿美元。据预测，疫情带来的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将使每年的资金缺口再增加1万亿到2万亿美元。“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全球长期资本，并重点关注环境、社会 and 治理三方面。可持续基础设施投资不仅是正义的，更具有经济意义。举个与大家日常生活都息息相关的例子，根据目前城市化和收入增长的趋势，到2025年，低于住房标准的人口可能增加到16亿，投资保障性住房能促进社会平等和社区经济发展，当前保障性住房每年的融资缺口达6500亿，这给许多发展中国家市场提供了良好的投资机会，这些市场需求旺盛，但保障性住房和按揭贷款却严重短缺。

联合国项目事务署已经在7个发展中国家推出了投资项目，在金融和发展方面带来了积极的影响。投资重要的基础设施项目是一项长期投入，加强多边开发机构、发展融资机构、商业银行和私人投资者之间的合作，能够产生更多机会，推动融资渠道多元化、降低风险、发展可行的投资结构。“一带一路”倡议以其出色的规划和投资，能给可持续基础设施投资提供大量机会，从私营部门获得可观的额外资源。私营部门和政府加大对可持续基础设施的投资，将创造数百万的就业机会，推动经济复苏。

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需要以新的思维认识和管理风险。世界银行的研究结论认为，“一带一路”运输走廊可以显著改善参与国贸易、外国投资和公民的生活条件，但同时，还需要提高透明度和债务可持续性，并减轻环境、社会 and 治理风险。今天作出的有关基础设施的决策，将决定我们共同的未来。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为发展中国家能源转型提供了机遇。国际能源署最近的一份报告称，每年的清洁能源投资将飙升至5万亿美元，到2040年，预计发展中经济体将消耗全球超过65%的能源。可再生能源投资能让发展中国家更易获取成本低、有保障和可持续的能源，从而减少排放，向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更进一步。中国承诺在2030年之前达到碳排放峰值，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排放。中国将停止在海外建设燃煤电厂，并加强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可再生能源的支持。这对全球气候行动至关重要。我们希望看到更多的“一带一路”投资，流向发展中国家的清洁能源发电资产和储能、输配电领域。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不仅需要投资，

□ 李楠（联合国项目事务署可持续发展基础设施投资与创新司长）

『一带一路』倡议为何聚焦基础设施投入

更需要新理念、新技术和创新。国际能源署的报告还指出，到2050年，几乎一半的二氧化碳减排，将来自目前仍处于验证或原型阶段的技术。这意味着在这十年里必须进行重大的科研创新，以确保这些新技术及时进入市场。中国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技术突破，特别是在电力传输和储存、风能和太阳能光伏领域，有潜力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人民产生重大影响。知识共享、技术合作、商业模式和投资，可以为欠发达国家提供重要的增长机会。“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也为科技创新和解决方案的跨境测试、试点和推广提供了机遇。中国在创新创业方面的经验和先进的创新生态系统，可以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企业家制定解决方案，获取技术和急需的风险资本，这在数字贸易领域已经有所体现。

为了实现共同繁荣，我们需要在创新解决方案方面开展更多的跨境合作，“一带一路”倡议为建立广泛的合作伙伴关系提供了机遇。面对复杂的全球挑战，要发挥出“一带一路”倡议的巨大潜力，需要关键利益攸关方建立伙伴关系，开展广泛合作并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果。在气候变化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迫切地需要全球合作。

（本文节选自作者在第六届“读懂中国”国际会议上的发言，题目为编者所加）



学习时报与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合办

（上接1版）而具体到人才工作上，高校的人才工作涉及教学、科研、学科建设等方方面面，需要来自全校各个系统的支持，更是一个系统工程。同时，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必须把握战略主动，做好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高校推进人才工作高质量发展，也必须以系统思维做好人才工作的顶层设计，以系统观念推进人才工作改革任务分解，不断夯实人才工作的政治保障、组织保障、服务保障。

坚持党管人才的正确政治方向，为人才工作提供坚实政治保障。做好人才工作必须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要鼓励人才深怀爱国之心、砥砺报国志，主动担负起时代赋予的使命责任。“双一流”高校应把握好人才队伍建设的正确政治方向，坚持党对人才工作的全面领导，不断完善党管人才体制机制，以为育人、为国育才的责任落实，推动聚才兴业的任务落实，推动党的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协调发展、深度融合，从而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人才队伍建设的特殊路径。特别是应注重发挥好党员在人才队伍发展建设中的模范带头作用，在学术骨干中发展、培养

一批政治强、业务精的先锋，以优良的党风正教风、促师风、带校风，引领人才队伍树立专业报国理想。

打通院校两级人才管理体系，为人才工作提供深入组织保障。高校工作的当务之急是根据需要和实际向用人主体充分授权，真授、授到位，发挥用人主体在人才培养、引进、使用中的积极作用。在高校体系中，院系是引才育才的一线，一方面需要充分放权，激发院系和学科自下而上的主体性，另一方面也需要自上而下把握好人才队伍建设的整体布局。特别是对于院系和学科跨度大、教师类型多样的“双一流”高校，只有将管理重心进一步下沉、给予院系充分的自主权，才能引导和激励院系灵活谋划、扩大视野、主动出击。北大通过完善高层次人才引进绿色通道、加强人才分类管理、优化资源配置方式等措施，坚持上下两级统筹，形成不同学科整体规模、结构、质量的合理人才布局。

精准构建人才服务体系，为人才队伍提供全方位服务保障。高校应完善人才管理制度，做好“后勤部长”，做到人才为本、信任人才、尊重人才、善待人才、包

容人才，让人才静心做学问、搞研究，多出成果、出好成果。高校也应该实现从管理人才到服务人才的思维转变，营造识才爱才敬才用才的环境，把最宝贵的资源投入到人才队伍建设上。在人才工作改革中，北大加强跨部门联动，实现精准个性化服务，引导教师潜心教书、静心育人、安心科研，为北大人才队伍打造更加温暖、更可持续、更有品质的新时代“人才的春天”。

在“双一流”建设中探索高校高质量人才平台建设的全新路径，汇聚顶尖人才

坚持聚天下英才而用之是做好人才工作的基本要求。中国发展需要世界人才的参与，中国发展也为世界人才提供机遇。人才不仅是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资源，也是高校发展的关键资源。高校应当努力抓住时代机遇，瞄准顶尖战略科学家、高水平创新团队与优秀青年人才群体，从引、育、评

三个维度做好人才工作的全过程全要素管理，搭建高质量人才平台。

主动引才，聚天下英才而用之。新时代新形势下，要实行更加开放的人才政策，不唯地域引进人才，不求所有开发人才，不拘一格用好人才，在大力培养国内创新人才的同时，更加积极主动地引进国外人才特别是高层次人才。高校作为相对开放的人才平台，应通过更加灵活的机制吸引不同类型的高层次战略人才。北大建立了高层次人才引进绿色通道，坚持主动出击、以才引才，对急需紧缺高层次人才，设立专门工作小组“一事一议”“一人一策”，在国际人才竞争中占据主动，为国家人才储备做“增量”。

倾力培养，得天下英才而育之。“双一流”高校作为高素质人才培养的主力军，必须坚定“我国教育是能够培养出大师来的”自信，源源不断地培养造就大批优秀人才。坚持立德树人核心任务，注重人才培养，特别是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各环节的革新，运用数字技术激活教学资源，提升学生创新能力。做好青年人才培养，按照“大胆使用青年人才，激发创新活力，放开

视野选人才、不拘一格用人才”的要求，厚植人才成长沃土，加大对青年人才的扶持培养力度，让更多青年人脱颖而出。注重在创新团队中培育和锻炼人才，探索试行团队负责人制度，给学术领军人才充分支持，努力培育可持续的重大项目攻关团队和有战略科学家潜力的优秀人才。

改进评价，使天下英才各尽其用。加快形成有利于人才成长的培养机制、有利于人尽其才的使用机制、有利于人才各展其能的激励机制、有利于人才脱颖而出的竞争机制。这就要求高校建立人才的良性竞争机制，充分尊重不同学科特点和人才成长规律，建立健全分类评价体系，针对不同学科构建不同导向、不同标准的评价系统，从而充分激发人才创新热情，充分释放人才创新活力。为深入贯彻落实《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持续优化“预聘—长聘”制度体系，完善学术评审机制，突出创新价值、能力和贡献导向，坚持“九步走”流程层层筛选、严格把关，探索面向未来学术发展潜力的人才评价新路径。

（作者系北京大学校长）